抗日正面战场

国民党参战将士口述全纪录

彤新春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抗日正面战场:国民党参战将士口述全纪录/彤新春编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000-8833-2

Ⅰ.①抗… Ⅱ.①彤… Ⅲ.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Ⅳ.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5661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李 晓 郭银星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66 千字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8833-2
定 价 4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言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辛旗

“口述历史”近些年在学术界风靡一时。作为一种史学新流派，虽说发端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然考其源流，实滥觞于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众多形同“口述历史”的经典了。“六经”皆史，其中就有大量的口述者说。对中国几千年文明延续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论语》，亦不失为一部经典的“口述历史”。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问夫子之语也。”《论语》除了其思想、人文价值外，我们从中亦可探寻到当时的社会制度、礼俗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其史学价值自不待言，或可称作“有韵之《史记》”。《礼记·玉藻》中有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中国古代早就有专门记载“口述历史”的史官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不是由后人写出来的，而是由当世人共同塑造的，对他们言行与感悟的记载才是最真实的历史。今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正是对中国古代“记言修史”传统的传承与光大。

“口述历史”项目最初是由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著

名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拟订并组织实施的。历时 40 余年，共收集整理了 70 多名民国时期名流硕彦的记忆资料。受访者都是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知名人物，或是与重要人物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士，包括国民党党务要人、民国军政元老、科学教育方面的著名学者、经济及工业界人士、社会名流等，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而这套《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正是从“口述历史”项目所搜集编撰的 120 余种访谈录中，经精心筛选后，按专题分册辑录而成的。系首次在大陆出版，可以说是继沈云龙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和台湾版《传记文学丛书》之外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又一史料全、涉及面广、忆述人士关键、史料价值极高的大型系列读物。

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命运多舛、艰难困苦的时代，亦是一个奋发图强、英才辈出的时代。这套书里既饱含了当世人血泪沧桑的经历、颠簸流离的人生，以及一种痛入骨髓的情感，也饱含了他们心系社稷、忧国忧民的感叹和抵御外辱、献身民族的理想与志向。这样的历史才是丰厚鲜活、有血有肉的历史。但是，该书的口述者大多是当年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其忆述口径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再加上所述内容皆为个人所见所闻，其中难免有记忆不周之处、亦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这就需要我们阅读时能兼收并蓄、去伪存真。他们的许多看法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因为它给我们展示的是历史的另一面，只有多面向的历史才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也使得这套书的出版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其一，补阙拾遗。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明白，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难研究。单凭文献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局限性很大。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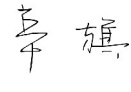
多重要事件，不是没有留下文字，就是重要档案尚未公开，甚至有许多东西被涂上了太多的脂粉。那么这套口述历史，或许可以给我们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带来一份惊奇与裨益。

其二，承前启后。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书中的口述者是“所见世”，在今天我们这些人是“所闻世”。我们能听到当世人的讲述，是我们的幸运。因此我们亦有责任把这些“所见世”者掌握的资料记录下来，把许多事情弄清楚，留下信史，这样才有“所传闻世”。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才不会因此而断绝，中华文明才能不断地繁荣发展。

其三，鉴往昭来。回顾近现代的中国，天灾人祸、更迭相加，国破家残，生灵涂炭。如今时过境迁，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与往昔大不相同，国泰民安、物阜民丰，处处散发着和谐之气。然《易经》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出版这套书，不仅是要提供一个认识近现代中国的完整视角，更是要“以史为鉴”以“知兴替”，从而可拒乱，乃至升平，直至万世太平。

愿我中华民族从此复兴，永享盛世。

泛泛为之一序，无以益其善美。



导　言

彤新春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与西方战场同样重要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持了太平洋战场的英美联军对德、意作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的70%，为赢得战争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如果没有中国的坚持抗战，日本军队就会全力南进东南亚与东攻太平洋，欧美各国将无法顺利执行“先欧后亚”战略，全力打败德、意法西斯。在中国的抗日斗争中，以国民党为重要力量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主的敌后战场对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其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浴血奋战，不惧牺牲、不畏强敌，尽管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甚至在后一阶段一味妥协退让、丧权失地，由积极抗日转向消极抗日，但其最终没有采取投降的民族气节还是值得肯定的，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牵制，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无法取得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同样不可能轻松地取得胜利。

（一）抗战发生的背景和特点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陷入极度混乱状态。为了摆脱危机，首先走上法西斯化的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挑起了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动，从1935年开始，埃塞俄比亚、西班牙抗击法西斯失败，奥地利、捷克不战而亡。1940年春夏之交，德国单独发动对英法的闪击战，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被占，法国投降，英国被打得只能困守英伦三岛。希特勒席卷西欧，接着又一路冲到莫斯科城下。

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功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然而，人多地少、资源稀有的经济禀赋，决定了日本必然走向扩张的道路，进攻路线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东北，进而指向中国大陆。20世纪20年代后，英国因过度扩张导致力量的空洞化，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收缩政策。30年代初，纳粹德国在欧洲扩张，引起了英美极度恐慌。为避免两线作战，英美对日本在中国的步步进逼妥协让步。国际形势及亚洲格局的变动，为日本提供了在中国扩张的条件，也使其取代中国主宰东亚的野心日益膨胀。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一味退让，希图避免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妥协政策导致了东北沦陷。

在国内，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从北洋军阀时代政治与社会极度动荡向国民党统治日益稳定的过渡，一些狂妄的日本人担心，中国的政治稳定及国力增长，将彻底断送日本占有中国市场的梦

想，“这是日本称雄东亚的最后机会”。[①]

1937 年 7 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大举增兵中国，希望对中国的作战能够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同时打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帜，意在以种族意识平息中朝等国对其侵略的反抗。有英美为后盾的国民党政权，对日本侵略采取了顽强抵抗的策略。日本明白，英美势力支持是中国不放弃抵抗的动力。1940 年，随着德、意、日签署军事同盟条约，轴心国集团形成，《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解决了日本的后顾之忧。于是，日本“南进”政策确定，并终于在东南亚对英美军队发起攻击。1941 年 12 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事件，也是出于彻底破坏美国海军实力、使之无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构想。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仅以 20％的兵力，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占领美法英荷隶属下的菲律宾、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南太平洋许多岛屿，英、美、荷军队，节节败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抗日战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孤军抗击日本法西斯达十年之久，日军虽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可是没有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抗战，极大地消耗和牵制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迫使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把 80％以上的陆军投入到中国战场。

抗战初期，总的形势是对日本有利而对中国不利。看一下中日经济实力的差距。至 1937 年日本工业可以与英美抗衡，农业则采用西方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而中

① 江沛：《世界化进程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广东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

国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10%”，而且“大部分还是手工业”；在农业方面，“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①] 强大的经济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实力。军事上力量更加悬殊，“1937年，日本已年产钢580万吨，飞机1 580架，坦克330辆，火炮740门，汽车9 500辆，造舰52 400吨”。[②] 而中国军队除能自制一部分兵器外，所有军舰、飞机、战车、火炮不能自制，都由国外引进。其他日军舰艇、飞机等力量也远远超过中国。因此从总的战争能力看，日本的战争能力要比中国强得多，如果加上军事组织力、内部的团结等因素，日本就更显强大。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战败为止，在中国战场始终保持百万以上大军，占其陆军的一半以上。正是由于中国战场牵制和消耗着日军主要兵力，束缚着日本伸向苏联的魔爪，使它一直不能北进，不能抽出兵力配合德军进攻西伯利亚，造成苏军两面受敌的局面，反而使苏联从东部地区调出50多万兵力，集中力量对付德军，从而扭转了危局。由于同样的原因，拖住了日本闯向东南亚的铁蹄，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1年12月，日本虽然冒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一度取得了海上优势，但由于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使得日军向西线作战，企图与德军会师于中亚的计划破产，并使美英联军得以较早地转入反攻。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② 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二）正面战场的几个阶段和过程

1937年7月～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它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起了决定性作用。1938年11月～1940年，虽然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了变化，但其军事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正面战场，因而正面战场仍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1～1943年，侵华日军对中国采取巩固占领区的方针，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1944年起，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作战逐渐向全面大反攻过渡，中国战场的大反攻，主要是敌后战场的大反攻。这就是中国抗日战场几个突出的发展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民族参与的抗日战争，出现了两个突出的大战场：即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而国民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正面战场，所谓“正面战场”是指中国人控制的连片国土与日军侵华推进线上日控区对峙交战而形成的战场。由于在这个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由于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拥有几百万人的庞大军队，地位不可替代。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无论兵力、武器装备等都还与日本有较大差距，尤其是武器装备。即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装备还仅仅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上，就更不用说抗日战争时期的装备了。人民军队这样的军事实力，确实难于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相抗衡。

抗战初期阶段的正面战场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平（北平）津

（天津）地区，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前进阵地，随即又陆续调集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展开战略进攻，企图迅速夺取冀、察、晋、绥、鲁五省，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企图速占上海，威胁南京，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以求在两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给天皇的报告中宣称，战争可以在两个月内结束；日本陆海军制订的作战目标是“覆灭排日抗日的根源的中央政府”，“通过全面战争，以期根本解决日中间的问题”，计划在三四个月内结束战争。日本决心集中兵力在华北的石家庄、德州一线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消灭中国军队，防止战争局势走向扩大或进入胶着状态，“极力避免对华中及华南使用兵力”。[①]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自卫权以应之”。[②] 8月15日，国民政府下达总动员令，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代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③] 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颁发《战争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的战略方针，以转换优劣形势，争取抗战胜利。为此，遂决定在平汉、津浦两线设立三道防线，以阵地战阻击日

①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四，台北，1984年版，第608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302页。

③ 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1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78年版，第178页。

军进攻；并同时在上海开辟战场，迫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避免侵华日军集中主力在华北与我决战。

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几大战役情况如下：

1. 平津战役（1937 年 7 月 7 日～7 月 31 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电令 29 军军长宋哲元就地抵抗，并调二十六路军 4 个师至石家庄、保定一线集结，作为侧翼支援。中国军队参战全部兵力 9 个师另 8 个保安旅，达 20 余万人。日军进攻兵力为 3 个师团另 2 个旅团，约 10 万余人，并有飞机 200 架、坦克 100 辆作为支持。7 月 26 日，日军在优势火力支援下，分别在廊坊、杨村、广安门、南苑、宛平城等宽广正面向中国军队猛攻。战至 29 日北平失守，30 日天津失守。是役，中国军队损失兵员 5 万余人，日军损失五六千人。

2. 太原会战（1937 年 9 月 13 日～11 月 8 日）

平津失守。侵华日军就把矛头指向华北战略重镇太原方向。动员 4 个多师团 14 万之众兵力，在 300 架飞机、150 辆坦克、35 寸一大炮的支援下，一路出大同，一路出石家庄沿正太路对太原实施向心突击。中国军队则集结了 34 个师、13 个旅，约 28 万人的兵力于太原方向防御，并得到挺进敌后的八路军 115 师、120 师、129 师有力的侧翼支持。整个战役，中国军队损失 11 余万人，日军损失 3 万余人。中国军队于 1937 年 11 月 8 日弃守太原。战役过程中的平型关战斗、忻口战斗曾使骄横的日军为之丧胆。

3. 淞沪会战（1937 年 8 月 13 日～12 月 13 日）

正当华北战场激战方酣之际，1937 年 8 月，日军大本营决定在中国华东开辟战场。进攻上海，直接威胁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以吸引并就地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为此，投入空前雄厚的兵力、技术装备，30 余万人，并得到

飞机500架、航空母舰3艘、各类舰艇50余艘、大炮千余门的强大支援。南京政府为保卫京沪杭根本重地，也倾其主力，计6个集团军70个师、250架飞机、40余艘舰艇、近75万人于淞沪战场，对日进行决战防御。整个战场历时4个月，中国军队伤亡三十多万，日军也损失兵员6万余人。但日军未能达成击破中国军队主力的战略目的。

4. 徐州会战（1938年3月12日～6月12日）

太原、上海、南京失陷后，中国战场重点就转向徐州方向。徐州是津浦、陇海路的咽喉，连结华北、华东的战略枢纽。徐州控制在中国军队手里，不仅可以屏障华中重镇武汉，还可以割裂侵华日军华北、华东两大战略集团联系。为保卫徐州，中国军队在李宗仁指挥下，集结了64个师3个旅，约45万人的雄厚兵力。日军投入的兵力，初期为8万余人，后期增至8个师团30余万人，得到火炮千余门、飞机300架、坦克200余辆的支持。战役持续了3个月，中国军队损失20余万人，日军也付出伤亡三四万人的代价。中国军队虽最终退出徐州，日军却未能实现歼灭这一地区中国军队主力的目标。其间，中国军队台儿庄一役的巨大胜利，更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5. 武汉会战（1938年7月23日～10月26日）

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规模最大的防御作战。中国方面投入作战兵力达124个师、约100万人、40余艘舰艇、100余架飞机，苏联援华空军志愿大队也参加了作战，防御纵深达400公里。日方为一举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腾出手来准备对苏美作战，也搜罗了中国战场上所能集结的机动兵力和火力。投入了12个师团、120余艘军舰、500余架飞机、1500门大炮，300辆坦克，约45万人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武汉进攻。会战持续3

个月，战况空前激烈。中国军队虽损失 30 余万人，日军伤亡也高达 10 多万人。战役持续到 10 月中句，由于广州失陷，中国军队统帅部认为继续防守武汉已无战略价值，遂于 10 月 25 日决定放弃武汉。[①]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国民党军共毙、伤、俘日军 25 万余人，牵制日军 70 万人以上，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其正规军损失达 104.4 万余人。[②] 日军在 15 个月内侵占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占领中国大中小城市 340 余座，13 个省的 1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国民党军正面战场防线，由中国沿海向内地后退约 700 公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在 1939 年至 1940 年的两年间，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1939 年 3～5 月）、随枣会战（1939 年 5 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 年 9 月～10 月）、1939 年冬季攻势（1939 年 11 月～1940 年 3 月）、桂南会战（1939 年 11 月～1940 年 11 月）、绥西作战（1939 年 12 月～1940 年 4 月）和枣宜会战（1940 年 5～6 月）等。这 7 次战役的规模都相当大，地域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南广大地区，每次战役日军投入的兵力均在 8 万～10 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投入的兵力至少在 20 万以上。正面战场在 1939～1940 年的两年里，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抵抗，因而给日军较大打击，共毙俘日军 26.3 万余人，同时也付出了 101.9 万余人的重大伤亡，与 1937～1938 年两年的伤亡人

① 刘谦忠：《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意义和失利原因》，《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 12 月。

②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1946 年，附表五。

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突出表现。

1941～1943年，是中国战场完全的战略相持阶段，其特点是军事上相持。日军作战重心逐渐由中国战场转移到南太平洋战场，对中国战场采取巩固占领区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方针，频繁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清乡”，敌后战场开始独立承担抗击日军的重任，并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正面战场的作用开始下降到次要位置。从1941～1943年，正面战场进行的主要作战有豫南战役（1941年1～2月）、上高战役（1941年3～4月）、中条山战役（1941年5～6月）、第二次长沙战役（1941年9～10月）、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年12月～1942年1月）、浙赣会战（1942年5～9月）、鄂西战役（1943年5～6月）和常德战役（1943年11～12月）。

国民党军在1941～1945年5年的伤亡总数（计853 603人），不仅不及1937～1938两年的伤亡数（1 084 379人），也比1939～1940年两年的伤亡数（1 019 911人）少。这个下降趋势，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国民党在1941年后确实消极抗日的事实。

抗战进入反攻阶段的正面战场

1944～1945年8月，敌后战场由局部反攻向全面反攻过渡。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缺乏主动性、全面性，只局限于西南一小隅。敌后战场从1943年8月的林南、卫南战役起就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且在苏联红军实施远东战役的同时，即已将持继一年半之久的局部攻势作战，发展成全面反攻，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最后一战”，取得了歼敌39.8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的重大胜利。然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加速从西南大后方空运至华北、华中和华南，抢占战

略要地，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对日大反攻不但不予协同配合，反而采取无理阻挠和破坏，甚至与日伪军暗中勾结，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致使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作战，在1945年9月2日日本于投降书上签字后，仍持续到当年年底。[①]

（二）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的作用和价值

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日本必然要占领中国广大地区，导致兵力分散、敌小我大，这个特点决定日本占领区的后方必然有许多空隙，因此，抗战不仅需要正规作战，需要敌后游击战争。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敌后游击作战给予一定的认识，由于重视的程度不同，两党取得了不同的结果。

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及时地提出了我军由过去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转变，决定向敌后进军，开辟敌后战场，进行敌后游击战争，并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任务。早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1937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准备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等人，提出对日作战，并实行正规战和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应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上，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月22～25日，党中央召开洛川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谈到军事问题时明确指出，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

① 刘庭华：《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

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关于军事方针是：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

抗战初期，尽管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积极的抵抗，但众多因素使国民党战场不断失利。与其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向敌后沦陷区大步前进，依据中央确立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逐渐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力量。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同敌人作战 1600 余次，毙伤俘敌 5.4 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口达 5000 万以上。敌后游击战不仅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而且迫使日军不得不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大量兵力保守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朱德同志曾指出：“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抗战开始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并未认识到中日战争的特点，没有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没有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①] 游击战被看作正规战的辅助手段。蒋介石说：“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的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

① 黎世红：《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